

## 朝鲜现代“新女性”的伦理选择：比较罗蕙锡《琼嬉》和金东仁《金妍实传》中的两个新女性

### **The Ethical Choices of “New Women” in Kore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New Women in *Kyeong-hee* by Na Hye-seok and *Biography of Kim Yeon-sil* by Kim Dong-in**

金顺珍（Kim SoonJin）

**内容摘要：**朝鲜现代时期的新女性既是“新”和“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不良”和“破坏”的象征。现代朝鲜虽然欢迎在社会上出现的新女性，但同时也采取了警戒和遏制她们的双重态度。讲述朝鲜现代时期新女性的罗蕙锡的《琼嬉》和金东仁的《金妍实传》展示了截然相反的新女性形象。对新女性的赞美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对现代的热烈憧憬和发展维系在一起。但是，现代朝鲜的新男性在欢迎步入社会的女性的同时，又不得不采取警戒和遏制她们的双重态度。男性知识分子出于不想与新女性分享享受新学问的权力和现代主体的地位，用父权式伦理，拒绝了新女性。而且朝鲜群众对新女性的批评是来自于有关“纯洁身体”的封建伦理和对女性消费主体的恐怖感。

**关键词：**新女性；启蒙伦理；两种伦理标准；琼嬉；金妍实传

**作者简介：**金顺珍，鲜文大学中语中国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韩中现当代文学比较、韩中女性文学比较、两岸文学比较，兼做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

**Title:** The Ethical Choices of “New Women” in Kore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New Women in *Kyeong-hee* by Na Hye-seok and *Biography of Kim Yeon-sil* by Kim Dong-in

**Abstract:** “New Women” in the modern period of Joseon symbolized newness and change, but, at the same time, badness and destruction as well. The modern period in Joseon took a double stance toward new women by welcoming them on the one hand, and by guarding against, and even controlling them, on the other. Two stories, *Kyeong-hee* by Na Hye-seok and *Biography of Kim Yeon-sil* by Kim Dong-in, both treat New Women in the modern period of Joseon, but the two women are very different, even opposite, from each other. The praises for new women demonstrated a passionate yearning for modernity emerging at the time. However, new men of the

modern period in Joseon revealed a double attitude of welcoming the new women and being cautious about their appearance. They even wanted to suppress the women. Male intellectuals of the modern Joseon, including Kim Dong-in, refused to accept new women based on the patriarchal ethics that made them hesitant about sharing with women the power to be attained through new learning. Critical stances of the people of Joseon toward new women were related to traditional ethical expectation of women's chastity and to the fear that women could learn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consumption.

**Key words:** New Women; Enlightenment ethics double attitude; feudal ethics; Kyeong-hee; *Biography of Kim Yeon-sil*

**Author:** Kim Soon-Jin, Professor at Sun-Moon University(31460, Kore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oss strait literature. And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Email:kimsoonjin@hanmail.net).

“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功能是什么？”，“文学应该怎么去阅读？”等等问题，都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以至于很难断定其论争开始的起点。但是，无论是什么答案，都离不开文学的本质是都与人、与人的生活有关的事实。人文学是需要认真思考人生终极目的和实践的学问领域。因此，文学也无法摆脱伦理问题。聂珍钊说过“阅读文学可以帮助人类获得道德启蒙，从而做出更好的伦理选择”（Ross 8）。

徐荣彩在《文学的伦理》一书序言中曾这样提出：在脱理念的时代，文学应该靠什么生存？然后马上给出了应该靠伦理生存的答案(7)。怀疑、否定、并推翻既定秩序，这才是文学的本性和伦理。如果说描绘我们应该创造的、世界的光彩画面是理念的事情，那么伦理则是想要透彻凝视我们欲望深处努力的产物。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的含义，和体现文学价值及指向的文学伦理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考察文学作品中人物矛盾和苦恼的内因，考察作品中内在秩序的文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终究也不能与作家的世界观以及接受该世界观的读者的审美价值取向完全分离。文学批评离不开伦理生存条件。聂珍钊也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给我们带来的道德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5-6）。

甲午改革以后，朝鲜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这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否定和对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事物认为是新的、进步的思维。在这种对

新事物的追求中，新女性登场了。新女性既是“新”和“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不良”和“破坏”的象征。现代朝鲜虽然欢迎在社会上出现的新女性，但同时也采取了警戒和遏制她们的双重态度。其实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尚必武 26）。可是混乱社会使当时的人们难以拥有正确的伦理意识，没有获得伦理意识的人们难以选择正确的伦理行动。

### 一、两个新女性的伦理选择

讲述朝鲜现代时期新女性的罗蕙锡的《琼嬉》和金东仁的《金妍实传》展示了截然相反的新女性形象。罗蕙锡的《琼嬉》描写了逐渐成为启蒙主体的女性。她们一边将原本属于女性领域的家务活儿改变成合理的、科学的，一边又改变着周围的旧女性。相反，金东仁的《金妍实传》刻画了以新女性的名义享受着自由恋爱，但最终却迎来悲惨结局的留日女学生。

琼嬉和妍实的欲望都是成为“新女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他们的伦理选择却分化为“modern girl”和“new woman”。这里的“modern girl”是指现代时期受外来影响，追求现代新生活的女性。相反，“new woman”是指拒绝过去没能成为主体的女性，想要成为作为人具有新主体意志的女性。如果说妍实的形象是“modern girl”，那么琼嬉的形象就是“new woman”。由于“新女性”具有这样的双重含义，所以朝鲜现代的“新女性”既成了新的象征，也成了应该否定的象征。

留日后，暂时回国的琼嬉，因父亲提起婚事，内心经历了激烈的矛盾。琼嬉可选择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顺从父母的意志，追求经济上稳定、舒适的道路；另一条是违背父母的意志，在经济上追求自力更生的艰苦道路。也就是说，这是作为子女尽孝之路和成为主体“人”之路之间的选择。琼嬉最终选择了后者，但是绝没有成为“离家出走的娜拉”。琼嬉的选择是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认识到做为“人”的尊严，体悟感恩之心，并自食其力。

“那么我的名称是什么？人啊！一定得是人啊。”，“即使是大麦饭，我也认为自食其力的人才是人。如果把祖先挣来的饭，丈夫原封不动地拿过来，你又原封不动地吃那碗饭，这与我们家的狗和一般人有什么两样！”“琼嬉也是人，然后才是女人。那么，是女人之前，首先是人。”“那好吧，没错，是人。如果不让人去寻找看不见的险路，那么让谁去寻找呢！”（罗蕙锡 120-21）

先成为人，然后成为女性的自觉，不想寄人篱下生活的意志，同时把这种觉悟和周围的旧女性分享的意愿，琼嬉所选择的道路是“new woman”之路。

相反，金东仁的《金妍实传》中，妍实的伦理矛盾则更为复杂。从表面上看，

与琼嬉一样，妍实也得在孝的实践和寻找自我的实践之间，做出伦理上的选择。不同的是，琼嬉没有做出离开父亲家的行为，但妍实拒绝了父亲的家，选择了前往日本的“娜拉”之路。在朝鲜父权社会中，女性去日本无异于离家出走（Han Min-Zu 183）。

但妍实根本的伦理矛盾却源自对母亲和父亲扭曲的感情。因为妍实的母亲是妾，曾做过妓女，所以觉得自己得不到爱，憎恨母亲，但对完全没有父亲风范的父亲却并不感到憎恨。妍实对在年幼的女儿眼皮底下，与年轻的妓女和毫无忌惮地做出性行为的父亲，从不表露出厌恶之情。也就是说，妍实虽然知道对母亲的憎恶是不对的，知道对自己处境的所有不满都向母亲发泄也是不当的，即使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父亲身上，但她仍然渴望着父亲的爱。对于妍实来说，去日本留学并不是从不被认可的封建家庭中摆脱出来建立新家庭或成为新人的自我意识中得以实现的。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伦理意识一旦出现混乱，没有受到伦理意识的正确指引，就很容易会采取不当的伦理行动，做出不正确的伦理选择，甚至是伦理犯罪（尚必武 27）。究其到底，妍实试图想在日本寻找到另一个“父亲”，同时希望自己成为“父亲”的化身。想寻找能够替代父亲给予自己爱的男人，体验父亲式的放荡生活。妍实虽然有想成为“女性先驱者”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只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缺乏国家或民族意识，没有想要改变国家或民族未来的欲望。对于妍实来说，只有成为“新女性”的欲望，而且妍实发现成为“新女性”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恋爱。

“恋爱”一词于 1912 年首次出现在韩国文学中。“恋爱”是以男女两人的感情交流为前提，对于习惯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当时社会来说，“恋爱”一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概念。但是，朝鲜现代时期新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对琼嬉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父权制的现代朝鲜社会，实现个人自我的最大障碍就是家庭。相反，对妍实来说没有这样的意识，她更看重的是实现自由恋爱本身，实现自由恋爱就是成为新女性的象征，因为她觉得“新女性”意味着权力。

但是妍实和琼嬉的身份认同既通过橱窗和他人的视线成为观察和监视的对象来形成自我，展示新女性形象，同时又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反省者的面貌来展示“新女性”形象。妍实的性麻木症透露出了感觉不到快乐而只拥有自由恋爱形式的内心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妍实的性麻木症可以防止她的性被男性所束缚，也给男性带来了无法满足女性的挫折感和恐惧感。因此，妍实的性麻木症既是作者对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的嘲弄，同时也透露出了他们因无法满足新女性欲望而感到的恐惧。

《金妍实传》将朝鲜现代时期新女性的面貌（虽然只是一部分），现实而又真实地描绘了出来，这一点比罗惠锡的《琼嬉》更具有伦理性。因为在朝鲜现代时期的新女性中，像琼嬉那样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并成功实践的女性，少之又少。甚至想要实践新女性生活的罗惠锡本人，最终也病死在街头。但是，

通过《金妍实传》不承认女性是独立的个人，不承认女性与男性是同等的启蒙主体，这是符合男性知识分子的伦理需求的。从这一点来看，《金妍实传》又是不够伦理的。说文学是非伦理的，不是因为某个社会的道德堕落相以文学的面貌登场，而是只限于通过文学来平息人的伦理意识时，文学是非伦理的（禹汉镕 115）。

## 二、两个作家的伦理选择

两种新女性的出现，源于两位作家看待新女性的相反的伦理意识。如果说《琼嬉》的作者罗惠锡具有先该成为创造新秩序力量的“人”的伦理意识，那么《金妍实传》的金东仁则具有想望维护男性权威的伦理意识。因此，罗惠锡正面刻画了琼嬉的自由本能，金东仁却把妍实的原始欲望，描绘成破坏当时伦理秩序的负面形象。文学生成的动因并非出于情感的表达，而更多的则是出自自身的伦理选的诉求（吴笛，顾发良 10）。这两部小说中两个女主人公的不同伦理选择就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同时也显示了创造她们的两位作家的不同伦理选择，还显示了朝鲜末动荡时期的社会伦理选择。

1918 年发表的小说《琼嬉》是韩国第一部现代女性文学，作家罗惠锡是韩国第一代新女性。她于 1896 年出生，辗转流浪于 1949 年病死街头。但罗惠锡的人生被赋予了很多“朝鲜第一”的修饰语。比如：她是朝鲜第一位女性西洋画家，婚后曾前往法国留过学，致力于改变女性地位的实践，1927 年 6 月从釜山出发，经过中国、俄罗斯，辗转欧洲各地和美国，是“环游世界的朝鲜第一位女性”。另外，她还公开发表过关于自己离婚的《离婚告白书》，描写对怀孕和生孩子感到恐惧的《当妈妈的感想记》，以及批判朝鲜男性双重贞操论的《单身女性贞操论》等，给朝鲜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罗惠锡在恋人崔承九去世后，对向自己求爱的金雨英提出结婚时要给崔承九立墓碑作为结婚条件之一的要求，可见对待感情方面她是一位非常坦诚的人。作家自己为了摆脱贤妻良母和三从四德的旧思想，在《琼嬉》中，琼嬉选择了寻找自我而不是家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相反，金东仁的伦理选择与罗惠锡有着很大的不同。朝鲜现代代表性自然主义作家金东仁通过《金妍实传》中的新女性妍实赤裸裸地描写了新女性的负面形象。从当时对新女性的新闻报道和杂志来看，实际上有很多批判新女性的内容。例如，在 1925 年 8 月 28 日《东亚日报》的“猫狗都是新女性”中，批评道：“恋爱了就是新女性，剪短发了就是新女性，离了婚就是新女性”。1939 年 12 月 29 日，在《东亚日报》的《瑶池镜“新学设以前”》中，李周洪说地球上的狐狸数和新女性的数相同，讽刺了狐狸毛围巾流行的现象。这与金东仁把金妍实描绘成把恋爱当做追随潮流、沉迷于消费的形象没有两样。金东仁所描绘的金妍实是朝鲜现代知识分子对虚荣心高涨的新女性给出的一棒，也可看作是作为日本殖民地知识分子有良心的伦理行为。

但不得不提到的是,《金妍实传》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以金明淳为原型的。生于1896年的金明淳与罗慧锡一样也是朝鲜的第一代新女性。1917年《青春》杂志的征文中,金明淳的短篇小说《怀疑的少女》入选,并她成为朝鲜现代第一位女作家。以后她发表过小说23部、诗歌107首以外,还留下了随笔、评论、戏曲、翻译作品等很多文学作品。也曾留学过日本,并连续在《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上连载过作品,具有超凡的能力。但是金明淳遭到了很多新男性的无差别攻击。在日本留学期间遭遇过恋人的强奸曾试图自杀的事件刊登报纸以后,当时很多男性新知识分子认为金明淳的品行有问题,进行了指责。但是金明淳未能从日本回到朝鲜,最终在精神病院结束了生命,而造成此后果的决定性一击就是金东仁的《金妍实传》。金明淳的小名是金弹实,有时也用于笔名,而主人公金妍实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弹实。另外,生于平壤,就读过进明学校,母亲曾是妓女,去东京留过学,从事过文学活动,是开化期的新女性以及因恋爱事件引起责难等诸多特征,由此当时流传着《金妍实传》的主人公是以金明淳为原型的传闻。此后,金明淳永远无法在朝鲜社会上露面,最后在日本的一家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时与其面对批判的内容,不如面对批判者的内在欲望更为适宜。当时新女性的登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有必要考察彻底否定和谩骂新女性的男性新知识分子金东仁的内在欲望和他的伦理行为。金东仁将妍实规定为假新女性的背后,潜藏着不想把新女性当做启蒙时期又一个权力的欲望。金东仁作为文学家想要展现自己才华的欲望与只追求新女性地位的《金妍实传》中的主人公无异。

在小说《脚丫子长得像》中,金东仁因为影射过作家廉想涉,曾引起过众议。从这一点来看,金东仁对其他优秀文学家的嫉妒心似乎相当强烈。这种文学上的嫉妒心在指向其他男性作家时,金东仁自己受到了攻击。但当指向新女性作家时,反而得到了其他男性知识分子的支持。正如金东仁自己也曾说过的那样:“金明淳是唯一有能力的女性作家”(Song Meong-Hee 199)。金明淳是具有很强的创作能力的知性女性。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却招来了其他朝鲜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仇视。

包括金东仁在内的朝鲜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对新女性所实施的暴力和仇视表明,新男性仍然没能摆脱父权式的伦理框架。在作品的开头,作者叙述妍实的性脱轨行为是因为其母亲是妓女,丝毫没有摆脱只想在女性之间的血统上寻找女性问题的父权式视角。相反,妍实的性脱轨行为是因为她父亲的不轨行为,但作品中哪儿都没有对其父亲进行过批判。同时,对与妍实享受性脱轨行为的多数男性也没有任何指责。反而,曾是妍实对象的男人却成了谴责和指责妍实的主体。与旧女性结过婚,但是离婚后又与新女性自由结婚的男性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启蒙的主体,但是追求与男性新知识分子恋爱的新女性却无法摆脱性方面的伦理批评。更何况,对于已婚的新女性来说,家庭这

个圈子仍然制约着她们，与旧女性的处境没有两样。男性知识分子无法容忍婚后也仍希望成为“新女性”的女性，“新女性”只能是婚前的“新女性”。对于金东仁来说，自由恋爱意味着放纵，但这只适用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新女性应该是男性启蒙的“新家庭”中的女性，绝不应该成为与男性同等地位的启蒙主体。

### 三、现代读者的伦理选择

最后，我们想要考察接受罗惠锡的《琼嬉》、金东仁的《金妍实传》以及新女性的朝鲜现代读者的伦理选择。朝鲜现代读者大致可以分为男性新知识分子和现代普通大众。

1923年10月杂志《新女性》创刊后，在城市知识分子社会里“新女性”成了大众用语，被尊崇和赞美为新时代唯一的先驱者和创作者。对新女性的赞美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对现代的热烈憧憬和发展维系在一起（金京一 45-47）。但是，新女性在保守的朝鲜现代社会的视线和评价中，并不只是赞美和崇拜的对象。像金东仁一样，新男性因为对现代国家的渴望，不得不容忍新女性，但却陷入了不想与女性分享权力的双重矛盾中。他们不甘心女性成为现代的主体。因此，现有体制势力试图把开始进入社会的女性送回家庭，把新女性重新定义为“不良分子”（Han Min-Zu 429）。以“开辟社”为中心的方定焕和车相瓚等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启蒙女性，创刊了《新女性》杂志，还做了《女性们，起来吧！》的巡回演讲。但同时也在《新女性》中嘲笑和批评了罗惠锡和金明淳等的第一代新女性。结果，现代朝鲜的新男性在欢迎步入社会的女性的同时，又不得不采取警戒和遏制她们的双重态度。男性知识分子出于不想与新女性分享享受新学问的权力和现代主体的地位，用父权式伦理，拒绝了新女性。

但是朝鲜的现代大众不能接受新女性的动机与知识分子不同。因为朝鲜的大众反正也不能成为启蒙的主体，大众对新女性的批判与对女性身体的封建伦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以“新女性的身体是不纯洁的”来指责。看穿大众伦理意识的男性知识分子，将自己对新女性成为启蒙主体的恐惧感转化成新女性“私生活紊乱、身体肮脏、无法控制肉欲”来批判。通过让新女性成为大众的笑料，成为朝鲜大众偷窥症的对象，以此来压制新女性的力量。

对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大众来说，新女性因为受到“不良”新文化的影响，具有破坏家庭秩序的不良因子，也是把纵欲合理化的虚伪人群（安淑媛 333）。甚至这种认识还会引发了对女学生读书、生活行为的批评。在《新女性》第2卷第5号中，朴达城对男女学生警告说，不要读小说或诗歌之类的读物（朴达城 54-57）。《新女性》第3卷第5号中，以女性笔者的声音主张自己做妾是因为“读了恋爱小说后堕落的”（惠兰 62-68）。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女性，但是与金东仁在《金妍实传》中将维特的悲伤、艾伦·凯(Ellen

Key) 的著作、黑田博士的著作等当作只重视肉体关系的恋爱书, 批评主人公金妍实是受这些书的影响, 只沉迷于肉体的恋爱的主张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 大众对新女性的指责和批评也是对女性消费权力的恐惧的表现。当时对新女性的奢侈和物质消费的批判横行, 这不仅是新女性特点的一面, 也是男性对新女性感到不安的反证。朝鲜的现代大众对新事物既有追求的欲望, 又对进步的事物持有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对于丧失国家的朝鲜现代大众来说, 最重要的伦理价值是家庭。但是新女性由于主张自由恋爱, 强调“女性”, 而不是“母性”。为了打扮自己成为消费主体的新女性, 被认为是挑战朝鲜现代大众家庭伦理秩序的罪魁祸首。在《新女性》第2卷5号(通卷7号)刊登的心汕的漫画《新女子百态》中, 还刊登了只寻找轻薄的高级布料, 只注重外貌的新女性的奢侈形象进行直言不讳批评的文章(心汕69)。

琼嬉和妍实都不是作为母性的女性。琼嬉拒绝结婚, 而妍实的纵欲可看作是妨碍了家庭的组成。在封建父权制家庭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不论是新女性还是旧女性都要去承担作为母亲的责任, 这一点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但是, 正如罗惠锡的《做妈妈的感想记》中所说的那样, 新女性似乎与母性不符。罗惠锡还主张“不忘记自己的幸福”(《新女性》第8期), 强调当女性失去主体性时, 个人和家庭也都绝对不会幸福。正是由于这一点, 更加大了大众对新女性的排斥感, 也体现了男性大众在家庭框架下无法控制女性身体而感到的不安。金明淳因现代朝鲜男性知识分子的暴力笔法, 最终在日本漂泊, 未能回国, 在精神病院结束生命。而罗惠锡辗转流浪、病死街头。这是由于没被现代朝鲜大众伦理选择的结果。

#### 四、结论

聂珍钊主张善恶的概念是与伦理意识同时出现的。人性是人区别兽的本质特征, 正是人性因子的出现, 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 使人从兽变为人。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 人的基本属性恰恰是由能够分辨善恶的伦理特性体现的(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4-6)。这时善恶的辨别不是动物的欲望, 而是指寻找作为人的价值的道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 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时, 伦理选择的标准也会随其时期和集体而发生变化。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人类社会就经历过从群居的“自然选择”阶段到后来的“伦理选择”时代, 即便是在“伦理选择”时期, 伦理道德观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在以往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观, 也许今天就是不再被认可的(张杰、许诗焱36)。而且, 在某一个时代的某个权力集团中, 都会诞生出梦想着新秩序的新生集团。他们从对现有权力的抵抗和叛逆而出发。因此, 新生集团的伦理与现有权力集团的伦理相违背是毋庸置疑的。



朝鲜的新女性是宣告新一代到来的标志，她自己应成为变革的主体，来改变新女性自己和朝鲜社会。但是，当新女性想与男性同等地成为启蒙主体时，她们被迎合大众伦理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暴力所除掉。罗惠锡的《琼嬉》和金东仁的《金妍实传》展现了针对“新女性”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新女性和男性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伦理价值观，而与此相关的两位新女性－罗惠锡和金明淳的人生和她们的死亡，体现了新女性和朝鲜现代时期大众的不同伦理价值观。

对文学进行绝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得不要添加评价时代的伦理标准，所以对文学的评价也永远是相对的。伦理本身就是以一个共同体和其正义通用的习惯和理念为前提的。但是当认为共同体的理念重要的时候不会成问题，但是当共同体的伦理失去力量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徐荣彩 44-45）。虽然父权制伦理成为整个社会的伦理时不会成问题，但是朝鲜现代的开始与新伦理的诞生是同步的，新女性是新伦理诞生的标志。但是朝鲜现代时期，民间和知识分子，男性和女性，旧女性和新女性等不同集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道德伦理法则。

新女性通过自由恋爱表达对自由的追求，这是想要成为主体性人的欲望，也是对父权制的反抗。如果对这种新女性的形象感到不满，那么这是承认自己是父权制思维圈子内的人。很多朝鲜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伦理选择都未能摆脱父权制的框架。而且围绕自由恋爱，现代朝鲜的伦理标准针对男性和女性是双重尺度的，这对现代朝鲜新女性来说无疑是悲剧。

### Work Cited

- 安淑媛：“罗惠锡小说《琼嬉》谈话论式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创刊号（1999）：331-356。  
[Ahn Sook-won. “A Study on Discourse and Performance in ‘Kyung-Hee.’ One of Rha, Hye-Suk’s Short Stories.” *Feminism and Korean Literature* (1999): 331-356.]
- 惠兰：“以早成为妾身的身體”，《新女性》第3卷5号（1925）：62-68。  
[Hye ran. “As a body that was once a concubine.” *New Woman* 3.5 (1925): 62-68.]
- Han Min-zu. *Bad Girls*. Seoul: Humanist, 2017.
- 金东仁：“金妍实传”，《脚丫子长得像》。首尔：Saeum, 2020. 273-333。  
[Kim Dong-in. “Biography of Kim Yeon-sil.” *Toes Resemble*. Ed. Kim Hwatoung. Seoul: Saeum, 2020. 73-333]
- 金京一：《女性的现代，现代的女性》。首尔：蓝历史，2004年。  
[Kim Kyung-Il. *Women’s Modern, Modern Women*. Seoul: Blue history, 2004.]
- Kim Won-hee. “Searching for Self-Identity in Na Hye-seoks Gyeong-hee.” *Literary Criticism* 71(2019):59-83.
- 罗惠锡：“琼嬉”，《晶月罗惠锡全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 95-122。  
[Na Hye-seok. “Kyung-h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Na Hye-seok*. Ed. Seo Jeong-ja. Seoul: Kookhak,

2001. 95-12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 1-1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朴达城：“男女学生的恋病与文疾”，《新女性》第2卷5号（1924）：54-57。

[Park Dal-seong. “Love sickness and literary illnes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New Woman* 2.5 (1925): 54-57.]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5): 7-14.

尚必武：“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文学跨学科研究》第5卷1号（2021）：22-30。

[Shang Biwu.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Ac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5.1(2021): 22-30.]

Song Ho young. “A Study on Kim Yeon-sil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n Women as a Main Subject.” *The Journal for Oversea Korean Literature* 26(2020):165-200.

Song Meong-Hee. “Ambivalent sexism against new women in the 1920s.” *The Literary Movement* 140 (2018): 182-201.

吴笛、顾发良：“从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文学跨学科研究》第5卷1号（2021）：7-13。

[Wu Di Gu Faliang “Three Forms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5.1(2021):7-13.]

心汕：“新女子百态”，《新女性》第3卷5号（1925）：69。

[Sim San. “New Women’s Variety.” *New Woman* 3.5(1925): 69.]

徐荣彩：《文学的伦理》。首尔：文学村，2005年。

[Seo Young-chaee. *Literary Ethics*. Seoul: Moonhakcun, 2005.]

禹汉谿：“文学研究的观点和有关伦理的问题”，《现代文学理论研究》6（1996）：99-122。

[Woo Han-young. “Liter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thics Issu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RY THEORY* 6 (1996): 99-122.]

张杰、许诗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论价值阐释”，《文学跨学科研究》第5卷1号（2021）：31-37。

[Zhang Jie Xu Shiyen. “On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5.1(2021):31-37.]